

■ 文化传媒研究

元代至近代临汾书院数量、分布及其变迁

高丽娟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尧都平阳”即今临汾。临汾古为“冀州”之地,正中冀州曰中土,中土亦可作“中国”,这便是“中国”一词的滥觞。临汾地处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它被誉为“华夏第一都”。在这片地域上孕育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帝王将相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等,这些人物的涌现与临汾当地的文明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一个地区文明的发达程度依托于教育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开展与知识的传授当然离不开与之相关的教育机构——书院^[1]。

关键词: 平阳府;临汾地区;书院;数量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7)09-0012-07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9.003

The Overview of Linfen Academy about Numbers,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from Yuan Dynasty to Modern Times

GAO Li-juan

(Anhui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of Huixue,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YaoDu Pingyang', that is today's Linfen. Linfen in Jizhou in ancient times, Jizhou called as center land, the center land also called China, this is the word "China" start. Linfen is loc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s called the Chinese first. On this land appeared important emperor and statesman, strategist, thinker, educator and so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aracters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civilization degree, and a region of civilization develop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undertakings with imparting knowledge, of course, inseparable from the related education institutions—academy.

Key words: Pingyang government; Linfen region; academy; numbers

就有关方志统计,临汾地区的书院历史上有 56 所,其中元建 4 所,明建 19 所,清建 33 所。步入近代,临汾地区改制的书院有 15 所。其发展历史经历了四个阶段:元代萌芽时期,是临汾地区书院的开端,其发展缓慢;明代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书院数量逐渐增多,分布范围开始扩大,在一些偏远地区也设立了书院;清代兴盛时期,书院在清朝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成为清政府文教体系的一部分;近代衰亡时期,近代临汾地区的书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走向改制,逐步被新式教育取代,淡出历史。而在每一阶

段都经历了曲折的建立与毁灭。从临汾书院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书院的发展沿革与临汾当地的地域文化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文化观念密切相关。

一、元代临汾地区书院创办情况、数量、分布特点分析

唐代的费君书院^[2]是山西最早见于记载的书院。而临汾地区最早的书院是晋山书院。元朝疆域广阔,统治民族众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各不相同,教育水平也极不一致。元代的统治者任用了

宋代的文官、武将,聘用汉民族的士人;提倡程朱理学和宗教;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保护和奖励学校教育和书院制度。这一方面利用了汉民族的先进的文化教育;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和汉民族的反抗情绪。元政府注意保护书院的政策,使各行省恢复书院建设,积极引导程朱理学北传,对一些著名学者、官吏

设置书院进行扶持,书院的建设在地域上也由南向北推广,以收据人心,巩固其统治。当时临汾地区的社会环境趋于安定,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逐渐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元代临汾地区书院基本情况见于下表一。

表 1 元代临汾地区书院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	书院名称	创办者	创办者身份	书院类型	备注
泰定二年(公元 1325)	平阳府治(临汾县)	晋山书院	石彦明	邑人	乡村书院 ^[3]	郭思恭为晋山书院山掌
至正五年(公元 1345)	吉州	书院名称不明	王士元	守臣	州级书院 ^[3]	原冯延登旧居
至正九年(公元 1349)	汾西县	凤池书院	梁济	知县	县级书院	
元	平阳府治(临汾县)	明养德书院	不明	不明		

注:参照王欣欣的《山西书院》,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和王冠英的《临汾地区历代书院研究》中的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表 1 的内容反映出,在书院数量和分布地域上,元代处于滥觞期,仅只有 4 所,其中的 2 所均位于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平阳府的治所临汾县。还有一所具体情况不详。从书院的创办者来看,创办类型为私人书院和官办书院两种。说明元代临汾书院作为一种私学组织,依赖民间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这种私人书院也可以称为乡村书院。而官办书院则属于最低一级的县级书院。官办书院相对于私人书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官办书院是由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对于书院发展所需要的经费供应充足,作为官办书院受到政府政策的保护,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士人们投身于书院教育,对于本地区教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两所书院创办于元顺帝至正年间,脱脱为挽回元朝统治危机,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史称“脱脱更化”,这与元顺帝“图治之意甚切”^[4]有很大的关系。

二、明代临汾地区书院创办情况、数量、分布特点分析

随着明朝建立,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渐强化,明政府初期对于文化教育的政策体现在官学的创办和提倡科举制方面,对书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而临汾地区书院在明代进一步发展,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颁下诏令:“愿与诸儒讲明治道,遍访天下贤士,招纳明经儒士。”^[5]书院在真正意义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主要因为书院自身是学术思想比较自由的组织,明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是控制思想的文教政策,不利于书院的发展。而相比之下,官学得到朝廷的支持,大多数知识分子寻求功名厚禄进入仕途为官,而不愿意退居山林讲学授业,使书院的发展受阻。而明中期书院

的发展出现新契机,由于受到新思潮的冲击,程朱理学的影响在消退,学者们冲破思想的束缚,这一时期官学也走向衰微,由于官学趋于僵化,缺乏思想创新,师资方面不思进取,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政治走向腐败。科举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吸引士子了,取而代之的是贿赂、钻营等手段。

明代临汾地区书院,较元朝书院数量激增到 19 所,从时间分布上来看,永乐年间创办了 1 所,弘治年间创办了 1 所,修复了晋山书院,在弘治三年也就是公元 1490 年由知府杜忠修复。基本内容可以参考表二明代临汾地区书院——中的备注一栏,正德年间创办了 2 所,嘉靖年间创办了 7 所,隆庆年间创办了 1 所,万历年间创办了 3 所,天启年间创办了 2 所,崇祯年间创办了 2 所。可以看出从嘉靖至万历年间是临汾地区书院迅速发展活跃的时期,临汾地区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创办的书院总数为 11 所,占到明一朝临汾地区书院总数的半成还多,到明朝后期的天启和崇祯书院的发展势头有所放缓。从分布地区上看,明代临汾县创办了 2 所书院,翼城县创办了 4 所,洪洞县创办了 3 所,乡宁县创办了 2 所,太平县创办了 2 所,襄陵县创办了 1 所,赵城县创办了 1 所,大宁县创办了 1 所,曲沃县创办了 1 所,吉州创办了 1 所,霍州创办了 1 所,其他的 6 个州县岳阳县、浮山县、汾西县、永和县、蒲县、隰州则没有创建书院。

从总体来看书院的数量和范围相比于元朝明显增长,临汾地区书院到明代跃出元一代的平阳府治所临汾县、汾西县、吉州 3 个府州县的狭小范围,创办书院的风气扩展到平阳府的其他州县地区,从表格中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明朝临汾地区书院主要集中于翼城县和洪洞县两县,这 2 县的书院

总数为 7 所,占到明代临汾地区书院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相比于其他的 15 个州县,这两县书院分布密度是很高的。其中有 6 所私人创办的书院,除了有 3 所创办情况不明外,其余均为官办书院,官办书院的数量也达明一朝书院总数的半成以上。可见在明

代官办书院占主导地位。从表二中可以反映出,私人书院的创办者为邑人、廪生、监生、生员、分守道参议、名儒和学者,而官办书院的创建者大多为知府、知县等。

表 2 明代临汾地区书院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	书院名称	创办者	创办者身份	书院类型	备注
永乐年间 (公元 1403—1424)	霍州	正学书院	曹端	霍州学政、知州	州级书院	曾用名霍山正学书院
弘治三年 (公元 1490)	平阳府治 (临汾县)	晋山书院	杜忠	知府	府级书院	元泰定二年(公元 1325)邑人石彦明创办的私人书院(乡村书院),弘治年间为官府所修复。
弘治四年(公元 1491)	襄陵县	姑汾书院	张文佑	知县	县级书院	由学庙改建而成
正德元年(公元 1505)	太平县	讲道河汾堂	黄钟	平阳府通判	县级书院	嘉靖十四年(1535 年)由耿儒(知县)重修。
正德九年(公元 1514)	吉州	文昌书院	丁汝谦史纪	邑人知州	官私合办书院	位于城南锦屏山顶,原吉州官民合建。
嘉靖十一年(公元 1532)	翼城县	泰山书院	吴廷翰	参政	县级书院	位于城北门外,冰清镇西北方向,泰山庙内。
嘉靖十一年(公元 1532)	翼城县	丽泽书院	不明	不明	不明	
嘉靖十二年(公元 1533)	翼城县	绵山书院	敏轩李诤	廪生监生	乡村书院	县属城东午家村
嘉靖十三年(公元 1534)	洪洞县	丽泽书院	董汝霖吴廷翰	生员分守道参议	乡村书院	董汝霖稟请改置,吴廷翰改建,城东北方向,原为泗州寺旧址。
嘉靖十三年(公元 1534)	洪洞县	相观书院	宋濂吴廷翰	生员分守道参议	乡村书院	宋濂改置,吴廷翰改建,原为千佛寺旧址。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 1548)	太平县	龙门书院	邹学书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讲道河汾堂
嘉靖间(公元 1522—1566)	赵城县	龙云书院	贺国定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罗云书院
隆庆五年(公元 1571)	大宁县	北寨书院	邵蕙	知县	县级书院	
万历年间 (公元 1573—1619)	平阳府治 (临汾县)	龙吟书院	桑拱阳	名儒	县级书院	位于金殿村
万历年间(公元 1573—1619)	乡宁县	鄂山书院	焦守己	知县	县级书院	
万历年间(公元 1573—1619)	乡宁县	云邱书院	不明	不明	不明	曾用名云台书院,在县城东南方向五十里五龙宫,邑人杨陶曾任主讲,“苦于无费,以树叶代纸,教徒练写”。
天启六年(公元 1626)	洪洞县	登瀛书院	赵京仕	知县	县级书院	北门外东北方向玉峰观,后废为祠。
天启年间(公元 1621—1627)	平阳府治 (临汾县)	河东书院	不明	不明		曾用名龙吟书院
崇祯四年(公元 1613)	翼城县	翔山书院	李士淳	知县	县级书院	位于城内同颖坊东北方向
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曲沃县	绛山书院	卫蒿	明末清初学者	乡村书院	

注:参照王欣欣的《山西书院》,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和王冠英的《临汾地区历代书院研究》中的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三、清代临汾地区书院创办情况、数量、分布特点分析

清代由于受到明中后期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裁量人物”风气的影响,清代前期的书院文教政策采取的是“不许别创书院”的抑制政策。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等都是反清的积极倡导者,其中一部分明代遗民以书院,讲堂为依托,组织发起反对清朝统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士这一阶层在唤醒世民反清复明意识取向方面起到了很大的鞭策激励作用,这种做法正是清朝当政者所深感忧虑的,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挑衅行为,清世祖九年清

朝当政者在尚未完全统一南北时宣谕:“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这与明朝张居正禁书院时所称“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的话不差一言,这写都是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进行思想文化专制的措施。

清代临汾地区书院,从时间分布上来看,顺治年间创办了 1 所,康熙年间创办了 14 所,雍正年间创办了 1 所,乾隆年间创办了 6 所,嘉庆年间创办了 2 所,道光年间创办了 2 所,咸丰年间创办了 1 所,

光绪年间创办了 1 所。其中洪洞县的养正书院,岳阳县的运昌书院,大宁县的正文书院,这三所书院具体创办年代不详,还有两所书院创办年代不明,分别是岳阳县的霍阳书院和曲沃县的学古书院。从分布地域上来讲,清朝时期平阳府下辖的 17 个州县中洪洞县创办的书院数量最多为 5 所,位居第二位的是大宁县和岳阳县均创办了 4 所,而临汾县、翼城县、曲沃县和浮山县都是创办了 3 所,其中曲沃县在清朝顺治十四年由贾汉复建立的官办的乐育群才堂,在清朝乾隆十二年由知县郑志鲸改名为乐昌书院,到清朝乾隆二十年由知县张坊改名为从教书院,清朝初年建立的这所县级官办书院改名两次。太平县创立了 2 所,其余的永和县、乡宁县、蒲县、隰州、霍州和吉州在清朝都只创立了 1 所书院,赵城县、汾西县和襄陵县在清代没有创办书院,而是修复了前代的书院,其名称或作调整。赵城县将明朝嘉靖年间知县贺国定在赵城县修建的龙云书院(龙云书院的旧名为罗云书院),在清朝乾隆十五年,由知县李超伦在赵城县建立了简城书院,也就是旧有的罗云书院或者龙云书院。康熙二十年汾西县知县蒋鸣龙创办的凤池书院是原来元代至正九年创办的书院。明朝弘治四年襄陵县的姑汾书院,由知县张文佑创办,到了乾隆三十一年,襄陵县的姑汾书院由知县陈朝书创办,所以这两所姑汾书院实为一所。同样在清朝雍正三年原名为脊交书院的玉峰书院由洪洞知县孔传忠建立,在乾隆四十年知府韩浩建立了玉峰书院,所以说两所玉峰书院实为一所书院。

到了清朝相比于明朝临汾地区的书院分布范围更加的扩大化,在元、明、清三朝临汾地区书院创建、

改建的过程中,各府、州、县书院分布基本普及了。书院更加趋于大众化。从明清两代临汾各地区书院的统计表来看,洪洞县和翼城县的书院创办较为可观,明清两代书院兴办数量在 3 所以上,这里以明清两代临汾地区的洪洞县为例,洪洞县在明清两代的书院创办中一直位居前列,明代洪洞县创办了 3 所,到了清代洪洞县创办的书院已达到 5 所,远超其他州县,而从明代至清代,岳阳县和大宁县书院创办增长速度较为迅速,明朝一代岳阳县没有创办书院,而到了清朝岳阳县创办的书院增至 4 所与大宁县所创建的书院数量相等,在 17 个州县中与大宁县位列清一代书院创建的第二位。而与之情况相反的是随着书院官学化趋势的发展临汾地区个别州县书院发展成倒退趋势,赵城县和襄陵县在明朝均分别建有一所书院,到了清朝只是修复了其明朝的书院,而没有建立新的书院。赵城县在乾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 1750 年,由知县李超伦将明朝嘉靖年间的龙云书院(旧称为罗云书院)改名为简城书院。而同样乾隆三十一年襄陵县知县陈朝书改建的姑汾书院为明朝弘治年间襄陵知县张文佑创办的县级官办书院。

清朝可以说是临汾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一朝临汾地区的书院总共创办 33 所,占元、明、清三朝书院总量的近一半,临汾书院的发展速度成倍增长,是元代书院数量的 8 倍还多,是明朝的 1 倍多年。可以说书院这一组织发展越来越成熟。其中康熙、乾隆年间创办的书院有 20 所,也占到了清一朝书院创办的半数以上,其中大宁县的正文书院、岳阳县的霍阳书院和曲沃县的学古书院创办年代不详,未列入上述的统计当中。

表 3 清代临汾地区书院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	书院名称	创办者	创办者身份	书院类型	备注
顺治十四年(公元 1657)	曲沃县	乐育群才堂	贾汉复	兵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河南巡抚	县级书院	先作社学之用,太祖八年,知县朱武建社学,宪宗二十一年,知县刘玘重修。神宗三十七年,知县赵彦复作书舍,思宗二年,县令张文光修社学。
康熙八年(公元 1669)	曲沃县	乔山书院	贾汉复	同上	县级书院	位于城南安吉村北
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汾西县	凤池书院	蒋鸣龙	知县	县级书院	创建于元代至正九年(公元 1349),为知县梁济创立。
康熙二十年(公元 1681)	洪洞县	讲学书院	朱璘	知县	县级书院	城儒学,东南方向
康熙二十年(公元 1681)	大宁县	图南书院	王维藩	知县	县级书院	创办不满期年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岳阳县	开运书院	朱亮采	知县	县级书院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 1699)	翼城县	扶风书院	马文镛	知县	县级书院	
康熙四十六年(公元 1707)	永和县	楼山书院	王士仪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莲池书院”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	隰州	紫川书院	钱以恺	知州	州级书院	位于安国寺东

续表 3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	书院名称	创办者	创办者身份	书院类型	备注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1712)	太平县	谦益书院	顾钦	知县	县级书院	未等建成便离任,书院终未修复。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1712)	翼城县	绍文书院	林世炳	知县	县级书院	潞公轩西南,旧为明代布政司行署。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	太平县	龙门书院	张学都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名为讲道河汾堂,世宗二十七年(公元 1548),知县邹学书创建。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平阳府治(临汾县)	平阳书院	宫懋言	知府	县级书院	曾用名名为正谊书院,是临汾地区历时最长、名声最盛的书院,江苏常熟举人方铎、福建霞浦举人陈德先、浙江举人胡兆崧、河南举人卫济出曾主讲。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 1722)	浮山县	陆公书院	不明	知县	不明	为知县陆张烈生祠,后改为书院。
康熙年间(公元 1662—1722)	洪洞县	希贤书院	范镐鼎	邑人	乡村书院	范镐鼎(1626—1707 年),字彪西,洪洞人。性孝友,阐明绛州辛全之学。康熙六年进士,以母老不仕。河、汾间人士多从之受经。十八年,以博学鸿儒荐,未起。立希贤书院,置田贍学者。辑理学备考三十卷,广理学备考四十八卷。国朝理学备考二十六卷,采辛全、孙奇逢、熊赐履、张夏、黄宗羲诸家绪论,附以己说,议论醇正。又著五经堂文集五卷,语录一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编,作续垂棘编十九卷,三晋诗选四十卷。
康熙年间(公元 1662—1722)	浮山县	清河书院	张尧	邑人	乡村书院	延请名宿,有文望者主课,集生童会文,造就多士。
康熙、雍正年间(公元 1622—1735)	洪洞县	养正书院	刘誌 刘镇	邑绅	乡村书院	位于东苏堡村
雍正三年(公元 1719)	洪洞县	玉峰书院	孔传忠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名为春交书院,城东门内
乾隆九年(公元 1744)	蒲县	崇文书院	徐常 许绍熙	知县	县级书院	因病离任,近虚立。乾隆十二年(1747 年),知县许绍熙卒其工,三十年(1765 年),更名南麓书院。
乾隆十二年(公元 1747)	曲沃县	乐昌书院	郑志鲸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名为原乐育群才堂
乾隆十二年(公元 1747)	霍州	霍山书院	陈钧	知州	州级书院	
乾隆十三年(公元 1748)	平阳府治(临汾县)	平水书院	不明	不明	不明	邑儒韩维镇名儒陈德先、王轩曾先后主讲。
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	赵城县	简城书院	李超伦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名为罗云书院、明嘉靖时为龙云书院。
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曲沃县	从教书院	张坊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名为乐育群才堂、乐昌书院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浮山县	神山书院	莫安近	知县	县级书院	位于察院旧址
乾隆三十年(公元 1765)	平阳府治(临汾县)	平阳书院	徐浩	知府	府级书院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 1766)	襄陵县	姑汾书院	陈朝书	知县	县级书院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71)	翼城县	许公书院	许崇楷	知县	县级书院	潞公轩,林公讲堂右侧。
乾隆四十年(公元 1775)	洪洞县	玉峰书院	韩浩	知府	县级书院	曾用名名为春交书院
康熙至乾隆年间(公元 1662—1795)	岳阳县	运昌书院	王士熠	邑人	乡村书院	创办时间及规制不明。
嘉庆九年(公元 1804 年)	岳阳县	石渠书院	常轼常录	邑人	乡村书院	义学
嘉庆十八年(公元 1813)	洪洞县	万安镇书院	刘汉疆	邑人	家族书院	又名刘家书院,私人书院。
道光六年(公元 1826)	大宁县	文昌阁	兰瑛	知县	县级书院	公事之余讲学,六年不辍,虽无书院之名,实有书院之惠。
道光十二年 ^[38] (公元 1832)	乡宁县	鄂水书院	崔光笏	知县	县级书院	
咸丰五年(公元 1854)	吉州	吉昌书院	张舒翹	知州	县级书院	城西门外,近开元寺
光绪二十年(公元 1894)	大宁县	书院名称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西北角,瘟疫庙后。私立书院,学生 10 余人,老师姓马,永和县人,束修全由学生负担。
清	大宁县	振文书院	不明	知县	不明	
不明	岳阳县	霍阳书院	任尔一	候选教谕	乡村书院	
不明	曲沃县	学古书院	不明	不明	不明	有房屋十五间,可容五十余人,实为义学。

注:参照王欣欣的《山西书院》,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和王冠英的《临汾地区历代书院研究》中的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四、近代临汾地区书院改制情况、数量、分布特点分析

步入近代,清末统治者的统治走向困局,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奏《请变通书院章程折》,认为:“查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书院制度发展到清末其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书院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弊病,这一时期书院的功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其一开始的讲道授业传播学术,到后来成为为官的工具,服务于科举考试,书院的日渐官学化,使绝大多数书院都由政府和官员控制,丧失了书院原有的自主性,自由性。所以书院改制刻不容缓,临汾地区书院改制也由此开始。“二十世纪之世界,一种族开智之世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以图生存,必先注重国民教育,使子弟有独立性质,社会无腐败陋习,然后可免天演淘汰公例,而始能安国于竞争之舞台,学堂之设刻不容缓。^[6]”

清朝临汾地区创建书院 30 多所,到近代临汾改制书院只有 15 所,改制最早的书院是霍山书院,改制于光绪二十八年,其中光绪二十九年有 5 所书院进行改制,是临汾地区书院改制数量最为密集的一年,占改制数量的三分之一,最晚的改制于民国元年也就是 1912 年,是岳阳县的开运书院,其中只有两所书院改制成为中学堂,分别是平阳府的平阳书院和霍州的霍山书院,其中的霍山书院还附设小学堂,其他绝大多数都改建为高等小学堂,总计 11 所。近代临汾地区书院的改制数量见于表四,其中赵城县和永和县这两县的书院在近代没有进行改制,其余以平阳府治所临汾县为首的 15 个州县均只有 1 所

书院进行改制。以洪洞县玉峰书院改制为例,从表中可以看出玉峰书院(又称脊交书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有资料记载“风气未开,民智锢塞,学堂负责人为原书院山长韩炯(清戊子科举人)。课程以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古文释义》为主,西洋历史、体育、学算、笔谈为辅。每午击鼓为号,群集山长室内大厅,由韩老师讲学一次。周三、六徒手体操,由学习体操较早的钟第领教,每周作文一次或两次。每月考试一次,即使不要求作八股,但不脱离旧有的模式。1906 年,洪洞李村人郭兆麟,任西学教员,讲物理、化学、算数、图画。韩老师是中文教员,讲历史、五经、古文等课,一日四堂课,另设堂长一人,由本县清末廪生李培堂担任^[7]”。可以从上述材料中看出,玉峰书院改制之初,人们对带有西学化的新式教育学堂并不是很了解,学习风气未开,人们思想一如既往的受到禁锢。而教学内容方面除了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还辅以西学,“这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只读四书五经的局限^[8]”从西学的这些教学科目和设置的体操课程来看,可以看到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些雏形,当时分为中西两大学科,并由主讲教师分科担任,其中的西学相当于现代教育中的理科,而中文则是文科的初步模型。中西两科门类多样保证了所学知识的全面性,但对于八股的部分保留则是一种封建教育的残余,对于上下课的设置“击鼓为号”在现代教育中已有改进,对于每日、每周、每月课业的设置也是较为合理的,中文、西学、体操交叉学习,不仅提高了知识而且有利于受学者身体健康的保证,其“每月考试一次”也同样督促受学者的课业,是对所学知识的一种检验,最后其设立的教员、堂长、山长为当代学校教育教师,校长的前身。这一系列体现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9]”。

表 4 近代临汾改制书院

改制时间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 书院名称		书院名称沿革	创办者	改建名称
光绪二十八年 (公元 1902)	永乐年间 (公元 1403—1424)	霍州	霍山书院	曾用名霍山正学书院,后改为正学书院,到乾隆年间改为霍山书院。	曹端(明) 陈钧(清)	中学堂附设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平阳府治	平阳书院	曾用名为正谊书院	宫懋言	中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雍正三年(公元 1719)	洪洞县	玉峰书院	曾用名脊交书院	韩浩	高等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乾隆三十年(公元 1765)	浮山县	神山书院		莫安近	高等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道光十二年[(公元 1832)	乡宁县	鄂水书院	曾用名乐育群才堂,	崔光笏	高等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曲沃县	从教书院	乾隆时期改为乐昌	张坊	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	清	大宁县	振文书院	书院。	不明	两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	隰州	紫川书院		钱以恺	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弘治四年(公元 1491)	襄陵县	姑汾书院		张文佑(明) 陈朝书(清)	襄汾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1712)	翼城县	绍文书院		林世炳	高等小学堂

续表 4

改制时间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	书院名称	书院名称沿革	创办者	改建名称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咸丰五年(公元 1854)	吉州	吉昌书院		张舒翘	吉昌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 1548)	太平县	龙门书院	曾用名讲道河汾堂	张学都	太平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乾隆九年(公元 1744)	蒲县	崇文书院	后更名为南麓书院	徐常	高等小学堂
宣统元年(公元 1909)	至正九年(公元 1349)	汾西县	凤池书院		梁济(元) 蒋鸣龙(清)	高等小学堂
民国元年(公元 1912)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岳阳县	开运书院		朱亮采	高等小学堂

注:参照王欣欣的《山西书院》,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和王冠英的《临汾地区历代书院研究》中的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纵观从元代至清代临汾地区书院的出现,发展与鼎盛,没落,再到晚清近代的书院改制,在历朝历代的大背景下临汾地区书院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有着临汾地区书院独有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这与大的时代背景是相吻合的。对于从元代至近代临汾地区书院数量、分布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的通过这些数据了解从元代至近代临汾地区教育的发展程度与水平,临汾地区历代建立的书院不仅在当时教化民众而且对当地世书院教风、学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参考文献]

[1] 孔丘. 尚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0.
[2] 曹寅,彭定求等.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陈谷嘉,邓洪波.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 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4] 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4224.
[5] 李东福. 山西教育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6] 刘泽民. 三晋石刻大全:尧都区卷[M]. 太原:三晋出版社,1998.
[7] 郭星明. 洪洞县教育志[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8] 严碧芳. 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研究综述 [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7(5):63.
[9] 张汉云. "立德树人"是素质教育的灵魂——素质教育内涵哲学解读三题[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7(2).

[责任编辑 李兆平]

(上接第 11 页)

能。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文化具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其政治性和经济功能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在推动社会关系改善方面具有“调节器”和“润滑剂”作用。传统优秀文化是前辈们在长期处理社会关系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是人类发展的非物质印记,对于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增加和谐因素,推动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新的历史条件下,道家思想仍然有其时代价值,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 宋秀英. 浅析古代德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湘潮(下半月),2012(10).
[2]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 杨海英.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道路的探索——访著名哲学家陈先达[J]. 高校理论战线,2010(9).
[4] 陈泽环. 核心价值观必须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基于中西文化基因及其历史命运的考察 [J]. 思想理论教育,2015(1).
[5] 胡绳.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 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6] 蒙培元. 中国哲学主体性思维[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陈章. 论实践的选择性[J]. 求是学刊,1989.
[8] 孟天运. 先秦社会想象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张岱年. 中国哲学史[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10] 老子. 道德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责任编辑 李兆平]